

三角对话中的斯特拉霍夫及其批评思想

朱建刚

内容摘要：俄国文学批评家尼·斯特拉霍夫因攻击去世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为学界诟病，其本身批评思想却反而极少被关注。文章首先从斯特拉霍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互动关系说起，理清了两者之间的分歧所在；继而引入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异同，重新阐释斯特拉霍夫在这场三角对话中的作用，揭示这位非主流批评家批评范式的革命性意义。

关键词：尼·斯特拉霍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 对话

作者简介：朱建刚，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国文学史及俄国思想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尼·尼·斯特拉霍夫文学批评研究”【项目批号：14BWW030】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俄国反虚无主义文学研究：以尼·斯特拉霍夫为个案”【项目批号：20080138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N. N. Strakhov in the Triangular Dialogue and His Idea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N. N. Strakhov was attacked for the fact that he made personal abuse on the late Dostoevsky. Meanwhile his ideas of literary criticism were ignored. Based on the primary sources including letters and artic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khov and Dostoevsky, and points out their disagreement. Then Tolstoy is introduced to be compared with Strakhov's and Dostoevsky's ideas. Lastly, Strakhov's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criticism's paradigm is discussed.

Key words: N. N. Strakhov F. M. Dostoevsky L. N. Tolstoy dialogue

Author: Zhu Jiangan, Ph.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a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Email: zhujg1975@163.com

对于斯特拉霍夫（Н. Н. Страхов, 1828—1896）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早有定论：即曾是朋友，此后出现思想分歧，乃至于斯特拉霍夫不惜暗中毁坏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誉。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老一辈的文学研究者多利宁（А. С. Долинин）、格罗斯曼（Л. П. Гроссман）就以详尽的史料介绍了两者之间的恩怨是非。或因时代限制，两位陀学前辈明显对斯特拉霍夫持贬低态度。^①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加之斯特拉霍夫在19世纪60、70年代一度以反虚无主义著称，多数学者都试图撇清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关系。布尔索夫（Б. И. Бурсов）、基尔波京（В. Я. Кирпотин）等陀学权威都认为，在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上，斯特拉霍夫是纯粹的诽谤与污蔑，最终自取其辱。

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国内学者。1986年，李明滨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一文坛公案。作者在文末明确指出：“斯特拉霍夫，这位有声望的、聪明的评论家，或者一时糊涂，忘了‘作品中的人物并不等于作者’这条原则，或者由于‘报复’心切，而一叶障目，看不见这条原则，所以在他挑起的这桩公案中最终败诉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仍然保持着他杰出艺术家的荣誉”^②。该文应该是目前W国内学界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唯一论述，不过在结论上并未超出苏联学者的高度。

总体而言，国内外研究者过多聚焦于斯特拉霍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关系，^③却较少注意到两人思想方面的异同。甚至有论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某些方面的惺惺相惜，来反证斯特拉霍夫居中挑拨两位大师的阴暗心理。事实上，这种判断一来贬低了这场争论的意义，二则不免有些矫枉过正。本文拟以当事人的作品、书信为依据，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转型特点，对这段历史公案再作一梳理，从而揭示出斯特拉霍夫批评思想的真正意义。这其中，当然也会牵涉到另一位大师——托尔斯泰的“证词”。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

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谓“攻击”，主要依据在于那封1883年11月28日致托尔斯泰的信。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描绘了一个自私虚伪甚至变态的作家，这实在令许多了解其友谊的人大跌眼镜。作家的遗孀安娜未读此信前颇不以为然地认为“斯特拉霍夫对我丈夫，除了好话之外，还能写出什么来呢？他总是把我丈夫视为杰出作家，赞赏他的行为，为他提供写作的话题和思想”（Достоевская 395）。这只能说明安娜的单纯，对丈夫及其友人的思想分歧缺乏更深入的了解。^④斯特拉霍夫是第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作者。如果说他对作家确如论者所说，因思想分歧导致人格攻击。那么他完全可以利用作传的机会好好揭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面目；或者退而求其次，拒绝安娜的要求，以免做违心之言。但他一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一边困惑不已：“我每天都在想，我为什么要写这个？”（Перепуска 303）这种两难的处境最大可能来自于批评家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不认同作家的思想，一方面又却不过作家遗孀的嘱托，夹杂于原则与人情之间左右为难。应该说，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在1881年2月3日给托尔斯泰的信里说：“自从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消息那一刻开始，可怕的空虚感就没有离开过我。好像半个彼得堡坍塌了，或者半个文学界死去了。虽然我们近来相处不甚融洽，但我觉得他对我有着极大的意义。在他面前我试图表现得机智而善良，尽管我们也有愚蠢的分歧，但彼此之间深深的尊重在我看来是无比的可贵。哎，多么忧伤！……一切都是空虚，空虚！”（Перепуска 266）伤痛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根据考证，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最早相识于1859年，彼时作家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不久。他非常器重斯特拉霍夫：“您是对我人生最有影响的人之一，我真诚地爱您和同情您”（29 [I]: 216）。^⑤客观地说，这种评价是以后者对他思想的准确理解为基础的。1866-1867年间，斯特拉霍夫在《祖国纪事》做编辑期间一连写了三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其中两篇针对《罪与罚》（1866）。斯特拉霍夫不但反驳了当时某些不利于作家的观点，维护了作家的公众形象，而且对小说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做了新的阐释。

斯特拉霍夫认为，《罪与罚》创造了全新的虚无主义者形象，之前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可笑可恶可鄙又令人生厌的东西。总而言之，小说对他们的表现究其本质而言无法激起我们的同情，反而激起我们的嘲笑和不满”（Страхов 100）。相比之

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虚无主义者比前人更深刻,更能揭示出他偏离生命的本质:“作者描写的是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极点,它再也无法向前发展了……表现生命和理论如何在一个人内心中进行搏斗,表现这种搏斗如何把一个人弄得精疲力尽,表现生命如何最终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小说的宗旨”(Страхов 102, 104)。批评家进一步指出:“很显然,作者满怀同情来塑造他的主人公。这不是对青年一代的嘲笑,不是责备或控诉,而是为之哭泣”(Страхов 101)。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斯特拉霍夫深刻地揭示出作家想要表达的主题:即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理论与活生生的生命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最终是以虚无主义理论的覆灭为结局的,无论这一理论是多么完备,充满严密的逻辑性。他的这种阐释不但得到了作家本人的首肯,也得到了后来陀学界的认可。格罗斯曼后来曾说:“在同时代人中,最能充分理解这一形象(指拉斯柯利尼科夫——引者注)实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亲密的战友尼·尼·斯特拉霍夫”(449)。

但文学终究有别于生活。需要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的分歧始终存在,这是由彼此世界观决定的。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追求某种终极目标,尽管他也说过:“我是世纪的产儿,迄今为止甚至直到我去世都会是缺乏信仰和彷徨怀疑的产儿(我知道这一点)”(28 [I]: 176)。这种“缺乏信仰和彷徨怀疑”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人物的分裂,灵与肉双重甚至多重的斗争,就其一生来看,很难说这种斗争的最终结果究竟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作家始终在矛盾痛苦之中寻找终极救赎,不管是“美将拯救世界”还是阿廖沙那种纯朴的宗教思想,都证明了这一点。

斯特拉霍夫一生擅长于纯理论的思辨工作,致力于与同时代人的对话。他既不追求著书立说,更不愿过多地介入生活。他的学生罗赞诺夫曾指出:“斯特拉霍夫永远在修饰、丰富别人的思想、别人的观点、别人的意图和情感。终其一生,他所有的工作在所有他为之努力过的领域——生物学、力学、心理学、形而上学——都是批判性的,毫无决断,甚至毫无创造的愿望”(Розанов 11)。对于罗赞诺夫所说的这种生活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有看法。他在1869年3月10号的信中告诫过斯特拉霍夫:“您的语言和阐述要比格里戈里耶夫好得多。文章异常明晰,但至始至终的**平静**(黑体字为原文所有——引者注,下同)使您的文章显得**抽象**。需要激动,有时需要鞭挞,需要屈尊俯就,议论一些最个别的现实的和迫切的小事情”(29 [I]: 18)。因“平静”而使文章“抽象”,究其根源在于对生活缺乏热情。斯特拉霍夫自身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里提到:“有一次我们在佛罗伦萨散步时……您十分激动地指责我,说我的思想倾向中有缺陷,您讨厌它、鄙视它,并将一辈子为之不安”(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6: 686)。这里“思想倾向中有缺陷”,指的仍然是斯特拉霍夫对文学的客观冷静,对生活的消极态度。这种态度,在着力于分析现代人内心分裂并试图从中寻得救世之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显然是要加以“讨厌”和“鄙视”的。

另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68—1871年给斯特拉霍夫的书信中,充满着恳求金钱帮助的各种哀求。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某些“讨厌”和“鄙视”,一方面是为稻粱谋的各种低声下气。尽管有友情来维系,但对敏感的作家来说这多少会留下某种心理阴影,并使得一些小事变为大事。比如,1875年初,因《少年》一书发表在涅克拉索夫等主编的《祖国纪事》上,双方矛盾升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妻子的书信中抱怨了斯特拉霍夫对他的冷淡:“不,安妮娅,这是一个可恶的宗教学校毕业生,不过如此。在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倒闭,他已经抛弃过我一次,而在《罪与罚》获得成功后又跑过来了。”这句话常常被后

来的研究者看做作家对斯特拉霍夫积怨已久的证据。事实上，作家在上句话的前面提到这次抱怨的原因：“……但斯特拉霍夫不知为何却对我眉头紧锁。即便是迈科夫，当他问及涅克拉索夫，并听我讲到涅克拉索夫恭维我的时候，他也是一脸的忧郁。而斯特拉霍夫则完全冷若冰霜”（29 [II]: 16-17）。这次事件实际上是一件小事引发的。根据安娜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接受涅克拉索夫的提议，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少年》，完全是因为涅克拉索夫开出了每印张 250 卢布的价格，超过了此前作家所获每印张 150 卢布的标准，还同意预支两三千卢布的稿费。^⑥斯特拉霍夫等人因此产生的对作家的冷淡，虽然有误解的成分在里面，但考虑到《祖国纪事》历来的激进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五斗米折腰，是否合适也值得斟酌。

1877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篇札记里又提到斯特拉霍夫，言辞更为激烈，近似人身攻击。他不但把斯特拉霍夫说成是普希金笔下的媒婆：“媒婆坐着吃馅儿饼，说话却含糊不清”，而且还说斯特拉霍夫是“最纯粹的教会中学生习气，这个出身无处可藏。没什么公民感和责任感。对那些鄙俗之事没有任何不满，自己反而从事这种勾当。尽管外表看似道貌岸然，暗地里却很好色。为了某种肥腻粗野的淫荡丑事，准备出卖一切：一切他未曾感觉的公民感，并不在意的工作及他从未有过的理想。他不是不相信理想，但因为粗鲁的肥腻的肉体，他就什么也不觉得了。我以后还会更多地谈到我们这个文学典型，得不断揭露批判他们”（*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T.83: 620）。

事实上，虽然斯特拉霍夫出身教会神甫家庭，但这跟公民感和责任感没什么必然联系（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教会家庭出身，这只能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潜在的贵族优越感）。从他一生来看，斯特拉霍夫属于那种安心书斋的知识分子，嗜书如命，终身未娶，以致托尔斯泰说他“天生适合纯哲学活动。这里的纯是指远离现实，而非远离从诗学和宗教角度来解释事物”（*Толстой*, T.61: 262）。1891 年 3 月，托尔斯泰夫人曾赴彼得堡斯特拉霍夫家中，她说：“斯特拉霍夫的家里到处都是书，他的藏书甚是丰富”（托尔斯泰娅 160）。1896 年 1 月 24 日，斯特拉霍夫去世，朋友们居然发现他的遗产不足以支付办理后事的费用，究其原因，他把绝大部分收入都用于买书上了。热爱真理、安于清贫——这是斯特拉霍夫作为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对这样的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好色”、“准备出卖一切”，不知依据何在。笔者以为，一则这段话只是作家随手写的札记，并不打算公开发表，所以尽情发泄；二来更重要的是，当时斯特拉霍夫跟托尔斯泰走得很近，这对一向对托尔斯泰持保留意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明显是个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谓的“准备出卖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指斯特拉霍夫叛变了他们的友谊吧？

对于斯特拉霍夫来说，友情是友情，原则是原则。尽管他在给托尔斯泰的信里表达了对亡友深深的怀念，但他无法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所描写的人格分裂，更无法接受作家在生活中的各种习性（如赌博、疯狂的恋爱、暴躁焦虑），这些特点与小说中所传达的作家理想差别极大。对于这种现实与文学的矛盾，斯特拉霍夫的解释是：“实际上他的所有小说都是自我辩解，它们证明在一个人身上，高尚的品质和各种卑鄙的行为可以共存”（*Переписка* 308）。这恰恰是批评家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的。在那封著名的书信里，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完全否定的评价。“这是个十足的小人，为人所不齿。他还自以为是讨人喜欢的人，是英雄呢。他只爱他自己。”并且说他在为作家写传记时“一直在做思想斗争，同自己心中升腾起来的厌恶心理做斗争”（*Переписка* 307）。这种想法直到斯特拉霍夫的晚年，在跟罗赞诺夫的信中仍然流露：“有件事令我高兴：您开始感

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在我看来，他对很多人有害；我认为对您——现在可以说了——也有害。他去舔别人的伤口，以此使自己痛苦并证明，这就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当然，在每个问题上他都动摇，思考是否需要”（Розанов 106）。

就现实层面来说，上述斯特拉霍夫的评价即便有言过其实之处，那也多半事出有因。作家夫人安娜曾因斯特拉霍夫这事专门写了公开信，为丈夫讨还公道，并在日记和书信里做了许多修改工作，以便维护丈夫的形象。这实际上反而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活中确实有值得非议之处，否则安娜也不必如此纠结，甚至去修改日记及书信。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更是彼此双方理念不同导致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现代化背景下人的分裂，这当然是一种真实，用他的话说他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реалист в высшем смысле）（27: 65）。但斯特拉霍夫作为黑格尔古典哲学的追随者，从来就不赞成人的内心分裂。俄罗斯学者Л. Р. 阿夫杰耶娃认为：“斯特拉霍夫的哲学观是在19世纪下半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及以斯拉夫派为代表的祖国思想传统影响下形成的”（Авдеева 111）。从他的著作《作为整体的世界》中可以看出，他赞成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对话，由此构成一个和谐共存的整体。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据30卷本的科学院版作家全集所显示，从1875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斯特拉霍夫虽偶有见面，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里也没再提到斯特拉霍夫，两人的友谊似乎从此走向了尽头。

二、第三者：列夫·托尔斯泰

说到这桩公案，我们必定要提到托尔斯泰。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但他是争论的起因之一，他的论断显然对斯特拉霍夫以及之后的研究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搞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关系问题，我们才能对斯特拉霍夫在两位巨匠之间的地位和影响有更为客观的认识。

早在1856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尚在西伯利亚时，他就在给A. H. 迈科夫的信里给久别重逢的俄国文坛做了一次排名：“我最喜欢屠格涅夫，只是遗憾的是，在他的巨大才华之中有许多不连贯的地方。我很喜欢列夫·托尔斯泰，但在我看来，他写不出很多东西（不过，我也许会看错）”（28 [I]: 209-10）。从这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虽对托尔斯泰有欣赏的一面，但这种欣赏是有保留的。这种保留尤其是在得知斯特拉霍夫高度赞扬托尔斯泰之后，表露得尤其明显。在1870年3月24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严肃地谈及此事：“我完全不同意您关于托尔斯泰的两行文字。您说，列夫·托尔斯泰可与我国文学中一切伟大现象相提并论。绝对不能这么说！……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29 [I]: 114）。“绝对”、“非常重要”说明这已不是寻常的文人相轻，更可能是两人思想上的尖锐分歧。

1871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里再次提及托尔斯泰的创作：“要知道，这全是地主老爷的文学，它尽其所能地说出了一切（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很好）。但这些说得很好的地主老爷的言词也是最后的言词了。取代这些言词的新话语还没有，永远也不会有”（29 [I]: 216）。在作家看来，托尔斯泰的作品再好，也不过是“地主老爷的文学”。言下之意，“地主老爷的文学”只关心那些上流社会的沙龙，贵妇人与纨绔子弟的风流史，他们哪里懂得拉斯柯尔尼科夫之辈的挣扎与痛苦，哪里懂得这个时代中俄国社会所面临的分崩离析？1875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说《安娜·卡列宁娜》：“小说相当枯燥，远非什么了不起的作品。我不明白他们因何赞赏”（29 [II]: 1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陀思妥耶

夫斯基文学观的狭隘。在《作家日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及他对列文这个形象的看法，其中对托尔斯泰不无批评：“列文喜欢自称人民，可这是个少爷，中上层圈子里的莫斯科少爷，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主要就是这个圈子的历史学家”（25: 205）。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摆脱社会中上层、庄园地主这样的写作身份。作家的这一论断遭到了斯特拉霍夫的反驳：“地主文学是这样的？多么无情多么骄傲的话，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战争与和平》最后以转向人民，转向卡拉塔耶夫告终，这跟您的思想应该完全符合。我只感到惊奇和莫名其妙……您怎么忘了柯里佐夫，涅克拉索夫……您的《死屋》？这不是人民的文学吗？”（29 [I]: 479）

1870年代末到1880年代初这个时期恰恰是托尔斯泰陷入思想危机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跟自己妻子说：“托尔斯泰几乎发疯了，甚至可以说彻底疯了”（30 [I]: 166）。这明显表达了两人之间深深的思想隔阂。总体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将托尔斯泰定位在出色的文学天才，但谈不上伟大。而“伟大”恰恰是斯特拉霍夫在阐释托尔斯泰时再三强调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刻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为了前者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少年》关系开始转冷淡的时候。一冷一热，分裂在所难免。

诚然，托尔斯泰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艺术，在后者去世后也跟斯特拉霍夫说：“他是最最亲近、宝贵、需要的人”（Толстой, T.63: 43）。可要知道，托尔斯泰欣赏的是40—6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思想探索，托尔斯泰并不理解，也不接受。就在上述那封信里，托尔斯泰提到自己“读完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深受感动”（Толстой, T.63: 43）。他最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是《死屋手记》。1862年初，托尔斯泰就找到了《死屋手记》来读，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读一遍这本书。1880年的9月26日，托尔斯泰又一次表达了对《死屋手记》的喜爱：“近日身体不适，读了《死屋》。很多内容我都忘了，此次再读一遍，不知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还有哪部书比得上它”（Толстой, T.63: 24）。难得托尔斯泰如此高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原因显然在于《死屋手记》具有的强烈现实意义，按他的说法是：“此书在观点而非基调上不同寻常：真诚、自然、符合基督精神。这是一部有教益的好书”（Толстой, T.63: 24）。这和托尔斯泰对文学真实和功利性的要求是一致的。相反，对于历来学术界所看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五大长篇，托尔斯泰倒反而兴趣不大。因为这五大长篇充分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探索，揭示了现代人内心的分裂，其思想是托尔斯泰既不愿去理解也不想接受的。^⑦因此，两位大师思想认识上的这个分歧，实质上决定了两人的关系不可能像研究界通常所认为的那般英雄相惜，尽管那是一种大家都乐于见到的状况。

1883年11月3日托尔斯泰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明确表示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否定：“您的信让我感到忧郁、失落，但我完全理解您，并且带着遗憾几乎相信您。我觉得您是跟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虚伪不自然关系的牺牲品。不是您，而是所有人都夸大了他的意义和榜样，把他这样一个死于内心善恶斗争最激烈之际的人抬高到先知和圣人的地位。他令人感动，也很有趣，但不能把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充满矛盾的人，作为后代学习的榜样”（Толстой, T.63: 142）。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后者内心的矛盾。类似的观点，高尔基在反对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群魔》的时候也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正是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高尔基 179）。原因在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都相信人性本善，人的心中有天国存在。文学作为人学，要努力表达真善美的一面，

而不应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怀疑人性的黑暗,表现内心的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后来现代主义文学的差异就是在这里,前者的代表是托尔斯泰,继承者是高尔基;后者的代表自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除了思想分歧外,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趋向于保守,不但写《群魔》来批评当时的虚无主义革命者,并且接连在声名不佳的《俄国导报》上发表小说,还担任保守派梅谢尔斯基公爵名下的《公民》杂志主编。原先沙皇专制的受害者居然反过来帮官方说话,这是那些头脑日趋激进的进步人士们所无法忍受的。1880年普希金纪念碑在莫斯科落成,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组委会曾打算将“反动保守”的作家拒之门外。相形之下,托尔斯泰尽管贵为伯爵,却历来爱惜羽毛,尽量与官方保持距离。托尔斯泰能成为“社会的良心”,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只能做“革命的先知”。

如此,不妨再看看托尔斯泰对斯特拉霍夫的态度。在对于参与生活的问题,托尔斯泰虽然不赞成斯特拉霍夫的那种冷静客观,但较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托尔斯泰承认批评家有保持客观性,不介入生活的权力。在1875年5月托尔斯泰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说:“客观性是一种礼节,就像大众必要的衣服。……但您的客观性太多了,会毁了自己,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Толстой, Т.62: 184)。尽管托尔斯泰一心试图寻找“小绿棍”因而不接受斯特拉霍夫的批评思想,但后者仍然对作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1896年初,在得知斯特拉霍夫的死讯后,托尔斯泰无心入眠,再度对生活进行了思考:“我生存着,但不是生活。斯特拉霍夫。今天知道他死了。……我躺下睡觉,但无法入睡,对生活的认识这样清楚、明了地浮现于脑海,从中我们仿佛感觉自己是旅行者”(Толстой, Т.53: 78)。短短几句话,不能不看出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在生活问题上的一定影响。

三、分歧的背后:独白与对话之争

问题在于,斯特拉霍夫在两位大师的生活与创作中都起到过重要作用,为何最终却不能借友成名,反在文坛落个骂名呢?其一是政治层面来说,斯特拉霍夫一贯的反虚无主义立场导致了整个苏联时期他的籍籍无名;其二,从思想角度而言,斯特拉霍夫思想中的对话原则在19世纪末的俄国尚无人能理解,伟大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者,都无法理解批评家这种强调多元与对话的思想原则。罗赞诺夫曾指出过批评家的这种思想孤独:“不得不说这是奇怪的事情,在60年代以降的二十年内,斯特拉霍夫是我们唯一的活着的、忘我奋斗的、自由的、走在前列的思想家。一切人落后于他,一切人在他身后或在他周围僵化了”(Розанов 15)。这二十年,自然包括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的二十年。既然无法理解,最终的交恶或冷淡也在所难免。

我们今天知道“对话”,多半来自巴赫金及其复调小说理论。巴赫金起初关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对话,属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后来逐渐上升到一种哲学高度。斯特拉霍夫的对话则是个人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他的一生都是在不断的争论与对话中度过:早年与虚无主义者;中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晚年与索洛维约夫、罗赞诺夫等等。有人称他为名人的影子,但更确切地说,他是名人的“显影剂”。正如俄罗斯当代研究者С. М. 克里莫娃指出的:“斯特拉霍夫属于那种极罕见的人,他们能够帮助别人理解自身并在理解自身世界观方面成为名符其实的对话者”(Климова 22)。这种角色定位在当时来说是独特的,独特到连斯特拉霍夫本人都未曾意识到。1890年5月21日,斯特拉霍夫曾写信给托尔斯泰,诉说自己所遭受的误解。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自身的对话者定位还不

甚清楚：“每当想到自己处在那种尴尬处境，我常常觉得很郁闷。当我说反对达尔文，马上有人想我是支持教理问答；当我反对虚无主义，那就认为我是国家和现存秩序的捍卫者；当谈到欧洲的有害影响，那就认为我是书刊审查和一切蒙昧主义的支持者，诸如此类。我的天哪，这多累啊！怎么办？有时候想，最好是沉默……”（*Переписка* 404）

事实上，斯特拉霍夫在这里所说的各种误解，恰恰是因为他的多元对话所造成的。世界在不断变化，一种思想垄断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俄国思想界需要对话，需要众声喧哗的自由。但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追求的都是以某种思想来解决人类的救赎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斯特拉霍夫与他们背道而驰。当然，斯特拉霍夫否定他朋友们的精神探索，并非意味着他与19世纪末的非理性主义志同道合。俄罗斯学者伊利因（Н. П. Ильин）指出：“斯特拉霍夫真正的哲学事业并非是否定理性主义，而是建立新型的理性，其核心在于理解行为，并且首先就是理解人自身的行为”（Климова 11）。这种“理解行为”的关键就在于众声喧哗之中不断的争论与交流，从而达到最后的理解。这与巴赫金后来提出的“对话”在理论、文化层面上有某种吻合。历史的荒谬是，帮助别人理解自身的斯特拉霍夫却反而不了解自身，正如他“与西方的斗争”恰恰促进了西方思潮在俄国的流行一样。

好在斯特拉霍夫并没有陷入绝对的孤独，他有一个理解他的学生罗赞诺夫。^①在题为《文学流亡者》的书信集里，罗赞诺夫这样概括了斯特拉霍夫的思想：虽然因涉猎过多而缺乏体系，但却具有绝对的原创性，因他从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他知难而上，越是困难的问题越是有兴趣。“这就是他没有写出一个包含宏大体系的著作的原因。‘简论’、‘概要’或者如他两次用来命名自己文章的‘正确提出问题的尝试’——这是用以表达其思想最常见也是最方便的形式”（Розанов 12-13）。我们认为，不必说在19世纪黑格尔哲学体系影响下的俄国思想界，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思想上的创新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

注解【Notes】

① 多利宁把斯特拉霍夫跟两大巨人的友情归纳为“青睐，并非真正心灵和精神上的亲近”。他认为：“在道德问题上貌似‘自由主义’，似乎多元的立场，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被视为‘自己人’，尽管遭致偶尔的批评和斥责；尤其是他涵盖人类创造多方面的宽广视野——使得斯特拉霍夫有权获得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人的青睐（斜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注）。”См.: А. С. Долинин, *Последние романы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63) 309. 格罗斯曼则说：“斯特拉霍夫的指责是缺乏事实和站不住脚的，因而是极不道德的”（315）。

② 李明滨：“俄国文坛的一件公案：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的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俄苏文学》2（1986）：99。

③ 最近也有国外学者强调斯特拉霍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分歧，但也只是略微提及。详情参见弗·尼·扎哈罗夫：“二二得几，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明确性中尚未明确的内容”，张变革译，《世界文学》5（2011）：265-273。

④ 别洛夫和图尼曼诺夫在为安娜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说：“在叙述社会政治及文学事件时，安娜·格里戈里耶夫那常常显得不自信，人云亦云，回忆录的风格也苍白无力，缺乏表现力。当她讲述起她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时，才又重新充满活力”（*Достоевская* 27）。

⑤ См.: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Л.: Наука, 1972-1990). 以下引文分别标出

卷数和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⑥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地去莫斯科跟卡特科夫商谈此事,卡特科夫表示愿意出同等价格买下《少年》,但无法预支稿费,由此作家最终决定与《祖国记事》合作(Достоевская 264-68, 620)。

⑦ 1910年10月18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再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惊讶于他的草率、虚伪和杜撰”,次日又说:“快速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卷,有许多好的地方,但非常不连贯。宗教大法官和佐西马的遗嘱”(Толстой, Т.58: 119, 121)。10月28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随身带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也许表明他打算重新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但目前尚无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⑧ 罗赞诺夫的《落叶集》的写作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斯特拉霍夫的影响,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Авдеева, Л. Р.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Ап. А. Григорьев, Н. 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Н. Страхов*. М.: Изд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2.

[Avdeeva, L. R. *Russian Thinkers: Ap. A. Grigoriev, N. Ya. Danilevsky, N. N. Strakhov*. Moscow: Moscow State UP, 1992.]

Переписка Л. Н. Толстого с Н. Н. Страховым. Т.2. СПб.: Изда. Толстовского музея, 1914.

[*The Correspondence of L. N. Tolstoy and N. N. Strakhov*. Vol. 2. St. Petersburg: Museum of Tolstoy, 1914.]

Достоевская, А. Г.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Dostoevskaya, A. G. *Memories*. Moscow: Artistic Literature, 1981.]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Gorky, A. M. *On Literature*. Trans. Bing Yi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3.]

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王健夫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

[Grossman, L. *Dostoevsky*. Trans. Wang Jianfu. Beijing: Foreig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7.]

Климова, С. М. и др. *Н. Н. Страхов в диалогах с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ми. 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культура понимания*.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10.

[Klimova, S. M., et al. *The Dialogue of N. N. Strakhov with Contemporaries*. St. Petersburg: Aleteya, 2010.]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83, 86. М.: Наука, 1971, 1973.

[*Literary Heritage. F. M. Dostoevsky. New Materials and Researches*. Vols. 83 and 86. Moscow: Science, 1971, 1973.]

Розанов, В.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згнанник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исьма*. М.: Аграф, 2000.

[Rozanov, V. V. *Literary Exiles: Memories. Letters*. Moscow: Agraf, 2000.]

Страхов, Н. 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СПб.: РХГИ, 2000.

[Strakhov, N. N. *Literary Criticism*. St. Petersburg: RCHI, 2000.]

托尔斯泰娅:《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上卷,张会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Tolstaya, S. A. *The Diary of Tolstoy's Wife*. Vol.1. Trans. Zhang Huisen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3.]

Толстой, Л. 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0 томах*.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28-1958.

[Tolstoy, L. N. *Complete Works in 90 Volumes*. Moscow: Artistic Literature, 1928-1958.]

责任编辑:王树福